

拉曼大學

中華研究院中文系

稼軒信州詠物詞 的“物我關係”考辨

科目編號：ULSZ3078

學生姓名：吳曉童

學位名稱：文學士（榮譽）學位

指導老師：余曆雄師

呈交日期：2016年8月19日

本論文為獲取文學士榮譽學位（中文）的部分條件

目次

題目	i
宣誓	ii
摘要	iii
致謝	iv
第一章：緒論	1
第一節：研究動機/選題意義	2
第二節：當前研究狀況/前人研究成果	3
第三節：論文構思/研究方法	4
第四節：研究資料/書目	5
第二章：稼軒詠物詞之創作背景	7
第一節：宋代詠物詞之發展	7
第二節：稼軒生平事迹與信州之淵源	11
第三章：稼軒信州詠物詞之獨特性	15
第一節：江、淮、兩湖之什詠物詞與信州詠物詞之異:	15
第二節：稼軒詠物詞與宋代詞人詠物詞之特質	22
第四章：現實中的“物”與信州詠物詞中的“物”之關係	27
第一節：“更無花態度，全是雪精神”	28
第二節：“十里芬芳未足，一亭風露先加”	30
第三節：“枉學丹蕉，葉底偷染妖紅”	34
第五章：結語	38
參考資料:	40

稼軒信州詠物詞
的“物我關係”考辨

宣誓

謹此宣誓：此論文由本人獨立完成，凡論文中應用資料或他人著作，無論是書面文字、電子資訊或口述資料，皆已於註釋中具體註明出處，並詳列相關的參考書目。

簽名

學號：13ALB07972

日期：2016年8月19日

摘要

本論文旨在對稼軒信州詠物詞的“物我關係”進行考辨，以探討信州在稼軒生平中所處的關鍵位置。此期的詞作尤以詠物詞居多，故從此期的詠物詞來探析現實中的稼軒與詞中“物”的關係。本論文之第一章，以緒論為主，並闡述研究動機或選題意義、當前研究狀況或前人研究成果、論文構思或研究方法、研究資料或書目。本論文之第二章，先從宏觀的角度來敘述宋代詠物詞之發展概況，從這個背景之下申論到南宋詞人辛棄疾。接著，便延伸到稼軒詠物詞之創作背景，再進一步以其生平事迹來探討與信州之淵源，從而凸顯出信州於其生平中之重要位置。本論文之第三章，主要是以凸顯稼軒信州詠物詞之獨特性為主，並以其隱居信州前期的詠物詞與信州詠物詞作出對比。基於鄧廣銘《稼軒編年詞箋注》只收錄了稼軒南歸後的詞作，故只能以江、淮、兩湖之什詠物詞與信州詠物詞作比較，進而針對稼軒詠物詞與宋代詞人詠物詞作出對比，後面的部分也會略述其詠物詩方面的表現。本論文之第四章，以考證現實中的“物”及信州詠物詞中的“物”之關係。所謂現實中的“物”，乃稼軒，而信州詠物詞中的“物”自然是稼軒在信州生活時所見之物。其中，稼軒以不同的“物”來作為吟詠的對象，通過考辨其詞中的“物”，再結合現實中的稼軒，可以發現信州之“物”承載了稼軒的品格及核心思想感情，使信州之“物”皆有“我”之色彩。本文之結論，將會概括整份論文所論及的重點而論。

[關鍵詞]：辛棄疾；信州；詠物；物我關係

致謝

光陰似箭，這一年來撰寫論文的日期終於來到了尾聲，也意味著我的畢業論文誕生了！在此，我要感謝每一個你們，讓我能順利完成畢業論文。

首先，由衷要感謝的是我的論文指導老師——余曆雄博士。余老師是一名知識淵博，又願意與人分享知識的好老師。猶記得，第一次拿余老師的課是元明清文選，自那時起，就對余老師的教課方式深感興趣。如今，能成為余老師的指導學生，實在是學生之幸。

在撰寫論文的期間，無論是遇到任何困難，余老師總是不厭其煩地給予指導及協助。儘管平日要處理個人的事務，加上需要指導學弟學妹們在作業上遇到的難題，但余老師還是願意在百忙中抽空來給予論文方面的指導。每一次與余老師會面，余老師總是十分有耐心地聆聽我在論文上所遇到的難題，並適當地指引我正確的方向。記得一開始余老師得知我所撰寫的論文題目後，就毫不猶豫地借出其珍藏已久的書籍給我，也額外建議我其他相關的書籍。對於這份“師恩”，除了謝謝，還是要謝謝余老師，我會銘記於心的。雖然每一次會面主要都是討論論文的事宜，但偶爾閒聊之間，其實可以發現余老師是十分健談的，因此每次的會面都是十分和諧、融洽的。這一年來，真的辛苦老師，也很感激老師的指導，讓我能順利完成論文。

接著，要謝謝的是在背後支持我的家人。以往每逢週末都會回家的我，因為得多花些時間在論文上，因此並不能常常回家陪伴家人。可每當稍有時間，我都會盡量爭取時間回家陪陪家人。在家，他們總是十分關心我，常常擔心我

吃不好，並不斷地叮囑我要多照顧自己。每每想到這，倍感溫暖，也有了堅持下去的動力。

這三年期間，感謝上天讓我遇到了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在撰寫論文的時候，也要應付報告及小考，其實有時真的有喘不過氣來的感覺。但因為彼此相互鼓勵、體諒對方，偶爾與他們出去吃吃飯，聊聊天，唱歌都讓我在撰寫論文的過程中能夠苦中作樂。無論如何，這三年所經歷的一切，讓我成長了不少，也獲益不淺。

最後，衷心地跟各位說聲“謝謝”！感激有你們。

第一章：緒論

辛棄疾（1161-1207），字幼安，別號“稼軒居士”，生於山東歷城（今濟南市）四風闌。稼軒是南宋著名的詞人，一生創作六百二十首歌詞，但這僅是一部分流傳至今的詞作，而其未南歸前的詞作早已無從考究。但無論是就詞之形式，內容或題材而言，其所創之詞作範圍甚為廣泛¹。其中，詠物詞更立足於兩宋詠物詞史，堪稱為詠物大家。在稼軒生平中，以於信州閒居二十年所創的詠物詞為數最多。

距其出生前十三年，發生了史稱的“靖康之難²”，對宋朝人民帶來莫大的屈辱。二帝被擄後，北宋便宣告滅亡，而倖免於難的康王趙構則逃至南京，建立了南宋。“靖康之難”所帶來的苦難與屈辱使得文人已不再淺酌低唱、倚紅偎翠，而轉向詠物來表現個人及民族因時代而發的悲慨及憤滿，其詠物詞延續了此主題。宋南渡以後，因朝廷始終實行兩國相安的政策³，故導致南宋長期處於苟且偷安之風。處在這樣的背景下，一生視抗金復國為己任的辛棄疾，加之仕途上受到連番彈劾，故閒居期間大量創作詠物詞以抒發其情志。

¹ 鄧廣銘《稼軒詞編年箋注》提到其詞有用以抒情，用以詠物，用以鋪陳事實或講說道理，有的“委婉清麗”，有的“禮纖綿密”，有的“奮發激越”，有的“悲歌慷慨”，其豐富多彩也是兩宋其他詞人的作品所不能比擬的。參見鄧廣銘（1986），《稼軒詞編年箋注》，臺北：華正書局，頁12-13。

² 據《宋史》的記載“夏四月庚申朔，大風吹石折木。金人以帝及皇后、皇太子北歸。凡法駕、鹵簿，皇后以漏，古器、景靈宮供器，太清樓秘閣三館書、天下州府圖及官吏、內人、內侍、技藝、工匠、娼優，府庫畜積，為之一空”引自元脫脫等撰，《宋史》第三冊，頁436。

³ 這裡的政策指的是“壬戌之盟”及“乾道之議”。“壬戌之盟”的簽訂條約為“以淮水中流畫疆，割唐、鄧二州界之，歲奉銀二十五萬兩、絹二十五萬匹。”引自元脫脫等撰，《宋史》第三冊，頁551。“乾道之議”的簽訂條約“為叔侄之國，歲幣減十萬之數，地界如紹興之時。”引自元脫脫等撰，《宋史》第四冊，頁630。

有關學界對稼軒詠物詞的研究範圍，一般是針對其一生所創的詠物詞研究，非集中於信州詠物詞。對辛棄疾而言，信州是一個關鍵的階段，其詠物詞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凸顯了其在特定時期底下的思想與情感。故本論文將研究範圍設定在信州，並通過其前期未隱居信州的詠物詞及具有詠物成分的文體如詠物詩作出比較，以探討信州詠物詞之獨特性。同時，也從稼軒信州詠物詞來探析現實中的“物”及信州的詠物詞中的“物”之關係。

第一節：研究動機/選題意義

關於研究動機，由於稼軒是史上少有文武兼備的南宋詞人，且在詞壇上又具一席之地，故筆者對其詞作產生興趣，並決定以其為論文的研究對象。在其各詞類中選擇了詠物詞，並鎖定在信州，一來是詠物詞中之“物”與創作主體之間往往是有著相關聯的關係，可以體現物與人同為一體此點。信州，亦是其詠物詞創作的豐盛時期，加之此期連番受到彈劾的經歷，故筆者將論文題目設為稼軒信州詠物詞的“物我關係”考辨。

以目前學界來看，皆攬括性或選擇性地研究稼軒詠物詞，不是就其一生的詠物詞而論，就是選擇特定的“物”作為研究。筆者認為既然信州是稼軒生平中的一個重要階段，而詠物期又是此期的產物，不應忽略信州及信州詠物詞之特殊性，故擇取相關的“物”來考辨。目前學界中並沒有相關的研究，故這是本論文的研究動機，也是選題意義所在。

第二節：當前研究狀況/前人研究成果

從當前研究狀況來看，有關稼軒詠物詞之研究為數不多。路成文著《宋代詠物詞史論》提供了有關宋代詠物詞的歷史背景及宋代詞人之詞論，其中有一章“詠物史上的稼軒風”提出了有關稼軒詠物詞表現之特點。許伯卿著《宋詞題材研究》則提供了宋詞題材方面的研究，其中有一章是“宋代詠物詞研究”，補充了詠物詞概念的界定及宋代詠物詞的淵源、題材構成、發展脈絡、興盛的原因及創新的前提。而其中在宋代詠物詞發展脈絡這章，就有詳細地論述了稼軒在這脈絡所處的階段。在孫崇德，劉德仕等主編《辛棄疾研究論文集》中有一篇〈論辛棄疾的詠物寓言詞〉也有涉及到詠梅花詞之討論。

在論文方面，林承壤〈辛棄疾詠物詞研究〉方面則是針對辛棄疾的生平階段所詠之詞作分析，提供相關詠物詞的題材分類資料。李瑩〈辛稼軒詠物詞的物與情〉則對詞中的物與情的關係進行分析，並提供了本論文有關這方面的資料補充。薛祥生〈稼軒詠物詞刍議〉則論述了稼軒詠物詞中的“形神”表現，寄託寓意及藝術手法方面的表現。馬赫〈淺議稼軒詠花詞的研究〉針對詠花詞而作出分析，從中也談論了稼軒詠花詞的藝術成就。

另，有些學者則選特定的“物”來做研究，其中佔最多的是花類，但多是在從審美的藝術角度的研究，于輝〈肛腸似火色貌如花——析稼軒詠花詞藝術特質〉、李瑩〈淺論稼軒詠花詞剛柔相濟〉，黃雪芳〈稼軒梅花詞的文學地位〉或是針對琵琶的〈試論辛棄疾的詠物詞——以《賀新郎·詠琵琶》為例〉皆以藝術角度而研究。

第三節：論文構思/研究方法

本論文所涉及的研究範圍為“稼軒”，“信州詠物詞”。故首先必須整理出與信州相關的詠物詞。筆者就鄧廣銘箋注《稼軒詞編年箋注》的作為依據，將焦點放在信州即帶湖及瓢泉時期，在仔細閱讀詞題後，抽取詞題附有“賦”，“題”的相關字眼及指明詠何物的詞，並從中再按“物”之各類型進行分類。筆者也嘗試尋找與稼軒其他方面的詠物作品，但因稼軒文章皆用以發表對政策的看法，故只能就鄧廣銘著《鄧廣銘全集》收錄的《稼軒詩文箋注》中抽取其詠物詩來與詠物詞作出比較。

本論文之第二章，主要以稼軒的創作背景包括宋代詠物詞之發展及稼軒生平事蹟與信州之淵源為基礎，以探討其是在一個怎樣的背景下創作信州詠物詞。對此，筆者參考了許伯卿著《宋詞題材研究》、路成文著《宋代詠物詞史論》及相關的論文〈宋代詠物賦〉以對宋代創作詠物詞的背景有所了解。而稼軒之生平事蹟，也參考了巩本棟著《辛棄疾評傳》、鄧廣銘著《辛稼軒年譜》、元脫脫等撰《宋史》、徐松輯《宋會要輯本》作為論述稼軒遭受彈劾而被迫退居於信州之背景的依據，以結合稼軒的信州經歷與其大量創作詠物詞有關。

稼軒之生平事蹟乃是構成其與信州淵源的所在，顯示信州在稼軒生平中的獨特性。在第三節，由此而延伸至信州詞之獨特性，故結合第二節與第三節的信州及信州詞之獨特性，可見信州詠物詞在稼軒生平中是不容忽略的。

本論文之第三章，筆者以鄧廣銘箋注《稼軒詞編年箋注》為依據，篩選了稼軒前期未隱居於信州前的詠物詞，即江、淮、兩湖時期與信州詠物詞進行比

較，並以許伯卿<辛詞題材構成解讀>的分析來論證信州詠物詞比前期居多之因。筆者除統計了此兩期詠物詞之數量及分析物之類型以外，劉揚忠著《辛棄疾詞心探微》的論述來分析稼軒這兩期詠物詞中的情感表現深淺之異。接著，在稼軒詠物詞及宋代詞人詠物詞，筆者讀了路成文著《宋代詠物詞史論》後，認為能以物我關係，情志內涵這兩點來比較稼軒與其他詞人之詠物詞。再者，亦略提稼軒詠物詩方面的表現，並參考了張馨心<稼軒“詩不如詞”現象探論>這方面的論述。

本論文之第四章，以現實中的“物”來探討信州詠物詞中的“物”之關係，意為現實中的稼軒與詞中所詠之“物”的關係，以鄭玄注《禮記·樂記》、劉熙載撰《藝概》、劉勰著《文心雕龍·明詩》來論述人與物密不可分之關係。筆者也參考了相關的論文如王麗璇<辛棄疾詠物詞略論>、薛祥生<稼軒詠物詞刍議>等以作為輔助資料。另外，賞析詞的過程亦參閱了鄧廣銘箋注《稼軒詞編年箋注》、吳則虞選注《辛棄疾選集》及唐圭璋主編《唐宋词鑑賞辭典》。另，亦加入有關前人對詞之評價，如王國維《人間詞話》、辛更儒編《辛棄疾資料彙編》及論文方面等論點以助於本論文之論述。

第四節：研究資料/書目

本論文所研究的題目與稼軒及詠物有關，故凡有涉及到此的相關資料會參閱。在論述稼軒的生平資料：陶爾夫，劉敬圻著《南宋詞史》、巩本棟著《辛棄疾評傳》、鄧廣銘《辛棄疾年譜》等都有相關的論述。以上的論述，提供了筆者在第二章劃分稼軒生平階段之依據。

稼軒的作品之收錄：鄧廣銘著《稼軒詞編年箋注》、鄧廣銘著《稼軒詩文箋注》、吳則虞選注《辛棄疾選集》收錄了稼軒詠物詞及詠物詩，這助於筆者篩選出相關的詠物作品。

宋代詠物詞之歷史背景及題材：路成文著《宋代詠物詞史論》、許伯卿著《宋代題材研究》、王兆鵬著《唐宋词史論》提供了宋代發展經過或涉及的詠物題材這方面的資料。

歷代學者的評價有：辛更儒編《辛棄疾資料彙編》、劉揚忠著《辛棄疾詞心探微》、吳則虞選注《辛棄疾選集》（附有關對稼軒之評價），陳良運主編《中國歷代詞學論著選》。

有關本論文所引用的期刊與論文包括：許伯卿〈辛詞題材構成解讀〉，張馨心〈稼軒“詩不如詞”現象探論〉，李瑩〈稼軒詠物詞的情與物〉，馬赫〈淺析稼軒詠花詞的研究〉。

第二章：稼軒詠物詞之創作背景

此章主要是論述稼軒詠物詞之創作背景，底下共分為兩個小章節來進行討論。第一個小章節是從宏觀的角度來討論宋代詠物詞之發展，以探討宋代文人如何處理詠物詞的發展過程。在未還深入討論此部分前，筆者先簡述有關賦、詩、詞三種文體所具有的獨特特質。但因“詠物”的關係而使三者特質上起了變化，逐漸發展至既能符合“詠物”描摹物體之要旨，又能將創作主體的情感融入於作品中的創作方式，並兼“詠物”及“抒情”之功能。

第二個小節則就辛棄疾個人而言，將焦點放在其創作信州詠物詞的背景，並就其生平事蹟來探討與信州之淵源。本論文的研究範圍設在其生平中的其中一個階段即信州，並以此來分析選擇信州之緣故及論述信州所具備的特色。另外，也會論及稼軒信州詠物詞的題材及所概括的“物”類。

第一節：宋代詠物詞之發展

入宋後，詞體發展興盛之際，亦促使詠物詞的發展，故宋代文人創作詠物詞蔚然成風，並締造了詠物詞大量生產的繁榮時代。詠物，乃中國古代各類文學最常見的體裁類型之一，並由各種文學體裁的詠物之作所構成，主要為詠物賦、詠物詩及詠物詞，其中尤以詠物詞為當時的主流。賦、詩、詞本屬不同的文體，各具有獨特的性質及功能。“賦者，鋪也。鋪采摭文，體物寫志也”（劉勰著；范文瀾注，1958，頁 134）著重於鋪陳，且長於體物，此乃賦之特點。

再觀詩體，“其託物寄懷見於詩篇者”（永瑤、紀昀等編纂，2003，頁 1216-619），說明詩乃主抒情，此屬性詞與詩乃相通的。

陸機《文賦》云：“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晉】陸機著；劉運好校注，2007）指詩賦各司其職，具有不同的功能，而詞體亦如是。詩詞作為兩種文體是異構而同質，二者皆著力於緣情。以詩之“緣情”，賦之“體物”來看，詞體似乎與原本的文學概念有不相符之處。因具有鋪陳體物之特點，故賦體似適用於詠物。詞與詩皆有“緣情”之功能，似乎與詠物文學無直接的關係，因二者的屬性非描摹物體。

然，此說法並非是一成不變的。當文人以物為文學中的表現對象，文體的特質往往會按各時代文人的審美趣尚如對物、情偏重之不同而呈現出不同風貌的詠物之作，故各體在本質上亦有所改變。簡言之，詩賦既能緣情，又能體物，或賦能緣情，詩也能體物⁴，結合詠物與抒情元素。按王國維著《人間詞話》中提到：“詞之為體，要眇宜修，能言詩之所不能言，而不能盡言詩之所能言。詩之境闊，詞之言長”（王國維著，2005，頁 24）所說的正是詞“能道人賢人君子幽約怨誹不能自言其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⁵ 雖詞與詩一樣主抒情，然在情感表達上，詞又比詩來得更加細膩、緣情。如此一來，詞又離詠物更遠。但看似離物更遠的詞在詩賦的基礎之上發展，已能結合詠物及抒情這兩點，只是側重點不同，此可通過宋代詠物詞的發展來進一步地了解。

⁴宋代詠物詩的兩大類型：一為有所寄託體物寓意的詠物詩；一為無所寄託的單純詠物詩。張滌雲〈略論唐宋詠物詩的寫法類型〉說：“細分起來，前一類有偏於寫形、偏於寫神、形神兼備等三種寫法；後一類則有托物擬人、緣物寫情、借物倫理等寫法。唐宋時期的詠物詩，很好地體現了中國詠物詩寫法類型的基本特色。”參見張滌雲（2006），〈略論唐宋詠物詩的寫法類型〉，《浙江教育學院學報》，2006年11月，第6期，頁1。

⁵張惠言《詞選序》，收錄在陳良運主編（1998），《中國歷代詞學著論》，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頁513。

北宋初文人因承襲了晚唐五代浮靡的文風，除了使得詠物詞具有冶艷之風外，也講究刻畫物之外在形態、注重形似，故此期詠物詞著重於“物”之呈現，而詠物意識也尚未明確。按許伯卿《宋詞題材研究》提到：“北宋前期詞人所愛只在花草的柔姿、色澤和香氣等外在感性之美”（許伯卿, 2007, 頁 131）。這反映了此期詞人多著重於物之姿態、顏色、形狀，故此期的一些詞人如晏殊、歐陽修、柳永、林逋、梅堯臣等所創的花草樹木詠物詞皆體現了。但對“物”之過度呈現，會造成詠物詞中的情感有所欠缺。可進入北宋中後期後，這種現象卻有所改變。

北宋中後期詠物大家如蘇軾、周邦彥等從五代冶艷氣息的框框跳脫出來，不再局限於對物之描摹刻畫，轉而拓展至賦予所詠之物以情感，並將詠物詞推向另一個發展。此期的詠物詞隨著詞人審美趣尚改變，而不再局限於描繪物之外態。蘇軾更是為詠物詞開拓了新的道路：“他的那些創作於特定心理情感狀態之下的詠物詞，創造性地導入詩學傳統，以‘物’作為主體自我情感、志趣的載體，通過詠物來傳達作者的主觀情志，也就是說作者自我開始進入詠物詞，使詠物詞具有了體物和言志抒情的雙重主題”（路成文著, 2005, 頁 95）。蘇軾對於物具“有我之色彩”，並亦深深地影響了許多文人，包括南宋詞人辛棄疾。從以上的發展來看，北宋時期的詠物詞發展，較為優秀的是有大量詠物名作的蘇軾及周邦彥，而此前的詠物詞發展仍有所欠缺。較之後來的南宋詞人，可見南宋時期的詠物詞已步向成熟的階段。

在未進入南宋時期前，南渡時期的詞人繼北宋後也有進一步地發展。陶尔夫，劉敬圻著《南宋詞史》提到：“南渡詞人的主要特徵是：經歷了“靖康之變”與南渡之苦，詞風有明顯變化，或為抗金復國而呼號，或為壯懷激烈而高

歌，或為撫時感傷而詠嘆，或為破國亡家而悲嘆。”(陶爾夫；劉敬圻, 1994, 頁 34)可見此期的詠物詞的內容必然是充滿鮮明的時代特色。此期的代表詞人於詞中的表現如李清照展現了現實苦難，朱敦儒展現了人格、李綱為首的“四大名臣”展現了個性。當然，也有其他的詞人如趨詩意化的葉夢得、向子湮、李邕遜等，題畫詠物的楊無咎，寫歌功頌德的曹勛、史浩等，也是此期的詠物詞發展趨向。

到了南宋，詠物詞已來到了一個成熟的發展階段。此期的代表詠物詞人可以分為兩派：一為辛派詞人；二為以姜夔為代表的典雅詞人。路成文著《宋代詠物詞史論》提到辛派詞人的特色是：“這些詞人多具有強烈的主體意識和豐富的人生體驗，大都具有很高的才性和很好的藝術素養。”(路成文著, 2005, 頁 54)辛棄疾因所處的時代背景之故，使其詠物詞的情志內涵也甚為豐富。其詠物詞延續了蘇軾對詞在抒情言志的開拓，以詞為“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也”(劉熙載, 1985, 頁 108)的文體，故其詠物詞兼具體物及抒情言志的成分。在此基礎上，其又進一步地開拓詞的情志內涵，有別於其他文人。辛棄疾“一腔忠憤，無處發洩……故其悲歌慷慨抑鬱無聊之氣，一寄之於其詞。”⁶縱觀辛棄疾一生視抗金復國為己任，然現實的經歷使其不能實現理想，更遭到多次的彈劾，唯有憑詞寄意，將滿腔悲憤化作首首詞作，而豐富的人生經歷使其詞具有強烈的主體意識及主體色彩，含有深刻的情志內涵。

⁶《梨莊論稼軒詞》，收錄在徐鉉撰；唐圭璋校注（1981），《詞苑叢談·品藻二》，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79。

第二節：稼軒生平事迹與信州之淵源

關於稼軒生平事蹟，筆者以巩本棟《辛棄疾評傳》為依據，並分為四個時期：一、出生至青少年時期（1 歲至 22 歲）；二、壯年時期（23 歲至 41 歲）；三、中晚年時期（42 歲至 63 歲），四、晚年時期（64 歲至 68 歲）⁷。第一至第二時期主要是辛棄疾南歸前後的事蹟；第三時期則是辛棄疾於信州閒居；第四時期則是晚期的辛棄疾仍恢復無望，最終含恨辭世。其中以第三時期即處於中晚年時期為辛棄疾人生之一大轉折點，皆因一心收復失地，抗金復國的辛棄疾，不但未能實踐抱負，只能委身於擔任地方官員，還遭他人屢次彈劾而被迫隱居信州（上饒帶湖及鉛山瓢泉）。此階段是本論文所研究的範疇。

據鄧廣銘著《辛稼軒年譜》的記載，其一生共遭受至少六次被彈劾的經歷，分別發生在淳熙八年（1181），紹熙五年（1194）七月及九月，慶元元年（1195），慶元二年（1196）及開禧元年（1205）。⁸其中淳熙八年及紹熙五年兩次彈劾的經驗，使其於信州度過了二十年的隱退生涯，本論文將分作前後兩個時段來論述。

前一段是在上饒的帶湖田莊定居，生活比較安定；後一階段因遭火災於 1196 年遷居到鉛山期思渡的瓢泉別墅。雖在 1192 年——1194 年曾一度再被起用，但只有較短時間（鄭臨川，1987，頁 34）。

⁷按巩本棟的歸納，其將辛棄疾的一生分為幼稟祖訓，文武兼資，壯歲旌旗擁萬夫，《十論》和《九議》，四任帥臣，三為運使，帶湖退居，紹熙再出，期思卜築及最後的恢復機緣與遺憾。而筆者依據此來總結了四個階段。參見巩本棟（1998），《辛棄疾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頁 31-114。

⁸按鄧廣銘《辛稼軒年譜》的記述，辛棄疾共遭到六次被彈劾的經驗。參見鄧廣銘（1997），《辛稼軒年譜》，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93-152。

說明辛棄疾長達二十年的隱退生涯，分別是在信州上饒帶湖及瓢泉度過的，足見信州在其人生經歷中是個關鍵的階段。自淳熙八年末因湖南創建飛虎軍事，而導致被彈劾落職退居信州帶湖，在相距十二年之久即紹熙三年才再次被起用。但此次被起用不到三年的時間，又再次被彈劾落職，故生活上的變化不免使到辛棄疾的思想、心態上都處於矛盾及複雜之中，而屢遭彈劾的經歷無論是對其人生乃至於創作傾向都有一定的影響，這也是本論文選擇研究此階段之故。但這並不代表其人生的其他階段相對來說不重要，只是自其退隱後，長達二十年都是在信州度過，加上閒來無事的退隱生活自然將更多的心思投放在創作上，故本論文認為值得考究。

至於在其眾多作品中，選擇信州詠物詞來作為研究內容，其一物向來與人及文學作品有着微妙密切的關係，文學中的物往往反映人的思想感情，而人又將情感投射於物；其二縱觀辛棄疾的人生經歷，其隱退後絕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在信州過，而在此期又以創作詠物詞居多，其借信州之“物”來反映出現實生活中的“物”之思想感情，簡言之，辛棄疾之思想感情通過信州周遭之物反映出來。

提到隱居信州上饒帶湖，乃與其於淳熙八年（1181）首次遭到彈劾有關。

《宋史·稼軒本傳》載到：“臺臣王藺劾其用錢如泥沙，殺人如草芥”（元脫等撰，頁 12164）。行政作風果敢嚴厲的辛棄疾，面對此番彈劾言論，加上當

時反對其者甚多，遂為其羅織罪名，而當朝又無查證，故辛棄疾因此而落職⁹。

此次落職，也開啟了辛棄疾在信州上饒帶湖長達約十年的閒居生活。

觀其詠物詞作，大多創於落職閒居期間。帶湖期間，即從孝宗淳熙九年（1182）至宋光宗紹熙二年（1192）這十年內，辛棄疾寫下大量的詞作。與此前為官時一樣，其詞大都是唱出時代的歌聲，反映出其欲抗金復國理想、重整故國的愛國豪情，同時也有嘗試通過各類的題材來排遣其無法實現復國理想的苦悶。縱然被迫退隱，無法施展其抗金復國的宏願，但卻因此促使其在創作上取得豐盛的成果。

至後來移居到瓢泉，得追究到慶元二年（1196），為其第五次被彈劾。據徐松輯《宋會要輯本》的記載：

慶元二年，九月十九日，朝政大夫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辛棄疾罷宮觀。
以臣僚言棄疾贓汙以恣橫，唯嗜殺戮，累遭白簡，恬不少悛。今俾奉祠，使他時得刺一州，持一節，帥一路，必肆故態，為國家軍民之害。（徐松，1977，頁 4049）

實際上，自紹熙五年（1194），其於福建任上已連番遭彈劾，直到慶元二年，全部官職已被罷免，故被迫再一次退隱。而適逢帶湖居宅失火遭焚，仕途上又失意，便正式遷居瓢泉。此時的辛棄疾也已邁入暮年。对其而言，第一次的劾罢尚对日后复出抱有希望，然不同於第一次，此次是短暂出仕不久后而被劾罢官，故对其思想上的打击甚大。此经历使得满怀抱负的辛棄疾更深刻地感受到

⁹徐松輯《宋會要輯本》載有：“淳熙八年十二月二日，右文殿修撰，新任兩浙西路提點刑公事辛棄疾落職，罷新任。以棄疾姦貪凶暴，帥湖南日瘡害田里，至是言者論列，故有是命。”此說明辛棄疾落職之故。參見徐松輯（1977），《宋會要輯本》，臺北：世界書局，頁 4004。

实现恢复的艰难，可想而知其当下的心情必然是更加痛苦又矛盾。這一時期，其所創的詞作數量與帶湖時期亦相距不遠，大多是抒發其壯志未酬的悲慨。

依鄧廣銘箋注《稼軒詞編年箋注》所考訂的時間為依據，本論文統計出帶湖詠物詞共有 38 首；瓢泉共有首 37，共為 75 首。就信州的兩個時期來看，稼軒信州詞之創作題材類型是多樣化的，除了詠物以外，另有詠懷、郊遊、祝頌、寫景、羈旅、隱逸生活不同類型的詞作。在各類詞作中，詠物詞尤其重要。無論是針對其生平的其他階段所創作的詠物詞而言，抑或是信州期間所創作的詠物詞的數量來看，信州的詠物詞皆佔最多的。

稼軒詠物詞題材涉及的範圍甚廣泛，如植物類，氣象類，飲食類，天象類，動物類等等，幾乎所有在生活中所見所聞的事物都能被吟詠一番。就帶湖及瓢泉時期而言，其所詠及之物也不少，除了當地的自然山水外，也包括了天象、花卉、建築、樂器、雜物、節令這些題材範圍。若按照以上辛棄疾帶湖及瓢泉時期所詠及的範圍再作細分的話，首先自然山水就詠及了山林，泉；天象如詠及雪；花卉就概括了各式各樣的花卉如牡丹、桂花、梅、茉莉、櫻桃、水仙、荷花、文官花、瑞香、野櫻花、羊桃和杉松；建築就如樓閣；亭台；樂器涉及了琴；節令就包括了立春、重陽。在芸芸的“物”中，花卉可說是稼軒詠物詞中居多之“物”，故多有詠花之作。

第三章：稼軒信州詠物詞之獨特性

前章論述了信州在稼軒的生平中是處於一個重要的位置，此章將會進一步地說明信州詠物詞的獨特性。信州乃處於稼軒生平中的第三個階段，基於各階段的經歷不同，所創作的詞也會隨之而有所改變。由此，必須就其未於信州閒居前的詠物詞來對比信州詠物詞，以探討信州詠物詞之獨特性。另，通過對比宋代其他詞人的詠物詞與稼軒詠物詞，來分析稼軒詠物詞在眾多詞人當中表現特出之原因。而詠物主題，除了用於詞，在其他文體如詩也存有詠物的成分。

第一節：江、淮、兩湖之什詠物詞與信州詠物詞之異：

據鄧廣銘《稼軒詞編年箋注》中對其詞作的整理結果來看，並無考出辛棄疾南歸前的詞作，故只能就其南歸前的江、淮、兩湖之什詠物詞與南歸後的信州詠物詞來作出對比。未隱居帶湖前，其曾在江、淮、兩湖之什任職，即起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迄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即稼軒生平的第二個階段。此期其創作了一些詠物詞作，但為數不多，經筆者的統計，僅有 7 首，包括《滿江紅·直節堂堂》，《滿江紅·照影溪梅》，《念奴嬌·晚風吹雨》，《好事近·日日過西湖》，《太常引·一輪秋影轉金波》，《摸魚兒·望飛來半空鷗鷺》，《賀新郎·賦滕王閣，高閣臨江渚》。

就數量及題材範圍而言，此期詠物詞的數量顯然遠不及信州詠物詞。題材方面，僅詠亭台，溪川或泉，中秋，湖及樓閣，相較信州詠物詞題材之多元化，

可見辛棄疾此期的創作重心並非在詠物上。按許伯卿〈辛詞題材構成解讀〉中對其進、退兩期詞之題材分析，其出仕期間多寫一些社會性較高的題材，如交遊、祝頌、詠懷；而退隱期間則多寫交遊、隱逸、詠物。¹⁰說明退隱時期的信州詠物詞比出仕時期的江、淮、兩湖詠物詞居多之因。

基於所處的階段不同，這兩期的詠物詞在情感表現方面必然會有所不同。由此，可以從稼軒詞作發展過程的五個階段來了解：一、發軔期（宦途上沉淪下僚的時期），二、風格衍變期（江西兩湖任職期），三、大家風範確立期（帶湖隱居期），四、風格再衍變時期（福建至瓢泉期），五、總結期（晚年期）。¹¹依此來劃分稼軒詞之發展，江、淮、兩湖的詞，實處於發軔期及風格衍變期，自然與後來發展越趨成熟的信州詞在情感表現上會不同。劉揚忠著《辛棄疾詞心探微》針對稼軒詞，即乾道四年至淳熙二年間的創作而提出這樣的論述：

在南歸之初的十來年中，他還只是受到冷落未得大用，尚未飽嘗讒毀中傷和打擊迫害的況味。被葉衡薦舉入朝之前的佐貳小官的身份，還沒有使他成為爭權奪利者的對手和眼中釘，這決定了他這段時間還不大可能受到打擊、中傷、猜忌與排斥，而更多地是產生懷才不遇、有力沒處使的苦悶……其中雖包涵了憂國的因素，但尚未充分體現出辛棄疾主體意識與思想情感的特殊性。

（劉揚忠著，1989，頁 159）

¹⁰ 許伯卿對辛棄疾進、退兩期所創作的題材作出分析，顯示兩期所詠及的題材不同。許伯卿（2005），〈辛詞題材構成解讀〉，〈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6期，頁114-115。

¹¹ 按劉揚忠著《辛棄疾詞心探微》的分析：一、發軔期（乾道四年（1168）任建康府通判至淳熙二年（1175）由倉部郎官出為江西提刑）。二、風格衍變期（淳熙二年（1175）自江西提刑之任始至淳熙八年底（1181）被王藺彈劾落職止）。三、大家風範確立期（淳熙九年（1182）至紹熙二年（1191））。四、風格再衍變時期（紹熙三年（1192）春始至嘉泰三年（1203）夏止）五、總結期（嘉泰三年（1203）起廢為浙東帥始至開禧三年（1207）鉛山長逝止）。參見劉揚忠著（1989），《辛棄疾詞心探微》，濟南：齊魯書社，1989，頁151-152。

江、淮、兩湖時期的辛棄疾，因不斷地輾轉於各州縣¹²，無法得到朝廷的重用。雖空有一身恢復國土的抱負，卻無法得以施展，使此期的詞多藉以抒發牢騷苦悶之情。其詞雖多發牢騷苦悶之情，但因此期仍正值壯年，盡是滿腔激昂之情，故能夠以樂觀積極的心態去面對仕途上的黑暗所帶來的衝擊。相較後期連番遭到彈劾的經歷，加之漸入暮年，思想變得深沉，而詞境也較前期抑鬱。這種抑鬱怨恨之悲調，是隨著人生的經歷而一點一點累積的，故江、淮、兩湖時期到信州帶湖和後來瓢泉愈加抑鬱悲沉。此點在信州詠物詞中更能顯現，正是因為詞本來已宜於抒情，當創作主體結合自身經歷，並將不宜直接抒發之情感投射於物中，就更加充分地展現稼的主體意識及思想感情的特殊性。

“南渡諸公詠之，皆有寄託”¹³，稼軒詠物詞亦貴在寄託。觀這兩個階段的詠物詞，皆寄託了個人及國家的感慨，然情感深沉的表現程度不同。首先，因觸景而引發個人的家鄉之思，再由家鄉之思到國家之悲及民族之痛的《滿江紅·題冷泉亭》寫：

是當年、玉斧削方壺¹⁴，無人識。山木潤、琅玕濕；秋露下、瓊珠滴。向危亭橫跨，玉淵澄碧。醉舞且搖鸞鳳影，浩歌莫遣魚龍泣。恨此中、風物本吾家。（鄧廣銘，1986，頁 14）

稼軒借詠冷泉亭而抒發內心複雜之感，“是當年”句，說的是“方壺”神山乃出自《列子·湯問篇》，並由“玉斧”所削成的，但在歷經滄桑後，

¹²按鄧廣銘《辛棄疾年譜》記載，辛棄疾在江、淮、兩湖時期擔任過建康通判、司農主簿、江東安撫司參議、提點江西刑獄、京西轉運判官、湖北安撫使、江西安撫使、湖南安撫使的官職。參見鄧廣銘（1997），《辛棄疾年譜》，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35-85。

¹³蔣敦復《芬陀利室詞話》，收錄在陳良運主編（1998），《中國歷代詞學論著選》，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頁 573。

¹⁴方壺，列子湯問篇：“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裡，有大壑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所居之人皆仙聖之類。”引自楊伯峻（1979），《列子集譯》，北京：中華書局，頁 151。

現已無人識。接著寫因秋露而形成的瓊珠般的水點滴落，使亭邊的木石都濕潤。“向危亭”句則從遊亭轉而寫秋天如碧玉般澄清。“醉舞且搖鸞鳳影，浩歌莫遣魚龍泣”（鄧廣銘，1986，頁 14）因遊亭而觸動其展豪情，再勾起身世之感。“醉舞”可想像到稼軒因醉而舞之豪情展現，其發出“浩歌”之感慨卻又怕“魚龍”聞之而泣，而此句的基調更顯得豪邁激昂。“恨此中，風物本無家，今為客”（鄧廣銘，1986，頁 14）因冷泉亭之景物與家園的景物相似，而觸動了其有鄉歸不得，只能做南方客之“恨”。冷泉亭與其身世有關，故借此來寄託其對故鄉及國家的感慨。《摸魚兒·觀潮上葉丞相》，借詠潮來寄託了對個人及國家前景的憂慮：

望飛來，半空歐鷺，須臾動地鼙鼓。截江祖練驅山去，鏖戰未收貔虎。朝又暮。悄慣得、吳兒¹⁵不怕蛟龍怒。風波平步。看紅旆驚飛，跳魚直上，蹙踏浪花舞。憑誰問，萬里長鯨吞吐，人間兒戲千弩。濤天力倦知何事，白馬素車東去。堪恨處：人道是、屬鏤怨憤¹⁶終千古。功名自誤。謾教得陶朱，五湖西子，一舸弄煙雨。（鄧廣銘，1986：33）

這首詞的上片是詠潮，下片則蘊含了稼軒之情感。開篇寫潮猶如“半空歐鷺”般覆蓋天空而來，顯示氣勢澎湃，雄偉壯觀的景象。如此駭人波濤巨浪，對於生長在江邊的“吳兒”卻早已司空見慣，更能輕易地於潮水中踏在浪花上，飄揚的紅旗，人如魚似地在浪濤中跳躍。而“吳兒”不畏懼如蛟龍般的巨浪的勇敢精神，正是稼軒所讚賞的。下句起寫因觀潮而聯想到與潮有關的歷史事件。

¹⁵ 吳兒，乃出自蘇軾《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絕》：“吳兒生長狎濤，冒利輕生不自憐” 引自蘇軾撰：【清】王文浩輯注；孔凡禮點校（1982），北京：中華書局，頁 484。

¹⁶ 《史記·吳太伯世家》：“十一年復北伐齊，越王勾踐率其眾以朝吳，厚獻遺之，吳王喜，惟子胥懼，曰：“是棄吳也。”……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屬其子於齊鮑氏，還報吳王，吳王聞之大怒，賜子胥屬鏤之劍以死。將死，曰：“樹吾墓上以梓，令可為器，抉吾眼置之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也。” 引自司馬遷撰（2014），《史記》第五冊，北京：中華書局，頁 1777。

“人間兒戲千弩” (鄧廣銘, 1986, 頁 33)乃指梁開平中錢武肅王命令以強弩射潮一事，然卻“滔天力倦知何事，白馬素衣去。” (鄧廣銘, 1986, 頁 33)。由“堪恨”始轉為寫伍子胥因不被吳王信任，並賜之予“屬鏃”之劍而死。因憶伍子胥被殺之遭遇而聯想到自己的身世，乃因其恢復中原的建議不被朝廷接受，故遭到攻擊。後寫范蠡與西施同舟泛湖而去，實以吳越興亡一事，而聯想到國家之命運。

而《滿江紅·照影溪梅》由詠梅而抒其胸有懷抱，卻無法被重用：“寶馬嘶歸紅旆動，龍團試水銅瓶泣” (鄧廣銘, 1986, 頁 14)可“寶馬嘶”、“紅旆動”皆是其豪情的表現；《太常引·建康中秋夜為呂叔潛賦》由詠中秋而抒其愛國情思：“一輪秋影轉金波，飛鏡又重磨。把酒問姮娥：被白髮、欺人奈何！乘風好去，長空萬里，直下看山河” (鄧廣銘, 1986, 頁 30)，於惆悵之中，又因為遐想於長空之下俯視祖國山河之壯麗，而轉為振奮的心情。

以上創於江、淮、兩湖時期的詠物詞，縱然因個人及國家而透過詠物來渲洩牢騷苦悶之情，但其調並不消沉，於低徊中可見其壯年之豪情壯志。但創於淳熙八年（1181）夏的《賀新郎·賦滕王閣，高閣臨江渚》抒發了國家命運堪憂之情卻是已趨沉鬱：“高閣臨江渚。訪層城、空餘舊跡，黯然懷古” (鄧廣銘, 1986, 頁 72)這固然是淳熙二年至淳熙八年，稼軒因在仕途上始遭到打擊，使思想漸變深沉，令其詞始變得沉鬱，此沉鬱之風乃是形成後來信州詞風的初期。

如前文所述，基於信州階段的經歷，思想之深沉亦導致稼軒借詠物來抒發其抑鬱難平之氣，從帶湖至瓢泉，其內心的惆悵、苦悶更是比前期更深沉，故

帶湖時期多由詠物而詠及屈原。《山鬼謠·雨巖有石，狀怪甚，取離騷九歌，名曰山鬼，因賦魚兒，改今名》詠山巖：

四更山鬼吹燈嘯，驚倒世間兒女。依約處，還問我：清遊權屢公良苦。神交心許。待萬里攜君，鞭笞鸞鳳，誦我遠遊賦¹⁷。（鄧廣銘，1986，頁142）

“山鬼”之出現，打破了夜闌人靜，“驚倒世間兒女”更是包括稼軒在內，使得稼軒長期壓抑在心之鬱結，此刻爆發了出來，並視與自己同有滄桑經歷的怪石為知己。下句“苦”字，不僅是指登山之苦，也指稼軒內心之苦。在仕途上，往往遭到彈劾的稼軒，難免會有知己難求之感，當其遇到“神交心許”的怪石後，儼然是稼軒將個人的情感、懷抱投射在此石上，並欲“待萬里攜君，鞭笞鸞鳳，誦我遠遊賦”（鄧廣銘，1986，頁142）歌頌著《楚辭·遠遊》，字裡行間所要表達地是欲追求像屈原之愛國精神，並自喻與屈原一樣因追求理想不得而產生的精神上之苦悶。《水龍吟·題雨巖。巖類今所畫觀音補陀。巖中有泉飛出，如風雨聲》：

不然應是：洞庭張樂¹⁸，湘靈¹⁹來去。我意長松，倒生陰壑，細吟風雨。竟茫茫未曉，只應白髮，是開山祖。（鄧廣銘，1986，頁141）

從遠處傳來的濤聲，難道是黃帝在洞庭之野所演奏的樂聲？或是《楚辭·遠遊》裡的湘夫人？兩者都不是，莫非是陰壑中所長的長松於風雨中吟詠？

¹⁷ 遠遊賦，遠遊。楚辭篇名。引自鄧廣銘（1986），《稼軒詞編年箋注》，臺北：華正書局，頁142。

¹⁸ 洞庭張樂，《莊子·天運篇》：“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引自王叔岷撰（2007），《莊子校銓·天運篇》，北京：中華書局，頁510。

¹⁹ 湘靈，《楚辭·遠遊》：“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引自蕭兵譯注（1998），《楚辭全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頁160。

稼軒有意借黃帝之樂來暗喻自己在聞樂聲後內心浮躁不定，也用《楚辭·遠遊》來表達自己內心的苦悶，並自喻為已是滿頭白髮的開山祖。《賀新郎·賦水仙》：“靈均千古懷沙恨。記當時、匆匆忘把，此仙題品。”(鄧廣銘, 1986, 頁 182)因賦水仙而聯想到“靈均”屈原投江之事，寫其壯志不能酬之“恨”。

瓢泉時期較帶湖時期又更為深沉、沉鬱，因此時的稼軒已漸年邁。

《賀新郎·題趙兼善龍圖東山園小魯亭》詠亭：

政爾良難君²⁰，晚聽秦箏聲苦。快滿眼松篁千畝。把似渠垂功名淚，算何如、且作溪山主。(鄧廣銘, 1986, 頁 340-341)

“政爾”句乃出自於《晉書·桓宣傳》的典故，借以說自己身為臣卻難見信於皇帝，甚至被猜忌之心聲。“松篁”有松竹之意，可這不是也表示稼軒的堅貞嗎？而且“千畝”，更有並非一朝一夕而生成的，而是隨著時間而增加，可見其堅貞精神之高。下句又轉入了消沉的基調，“垂功名”有恢復抱負不可圓之意，因而“淚”，故唯有作“溪山主”。稼軒詠亭之餘，又投射主題情感，詞中連續出現“難”，“苦”，“垂功名”，“淚”的詞彙使其詞的情感抒發十分強烈。

在《水龍吟·用些語再題瓢泉，歌以飲客，聲韻甚諧，客為之酌》詠泉：“君無助，狂濤些。路險兮山高些。塊予獨處無聊些。”(鄧廣銘,

²⁰ 政爾良難君句，《晉書》：“時謝安女壻王國寶專利物檢行，安惡其為人，每抑制之。及孝武末年，嗜酒好肉，而會稽王道子營尤甚，為狎昵諂邪，於是國寶讒諛之計稍行於主相之間。而好利險詖之徒，以安功名盛極，而構會之，嫌隙遂成。帝召伊飲讌，安待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無迕，即吹為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請以箏歌，並請一吹笛人……伊便撫箏歌而怨詩曰：“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引自【唐】房玄齡等撰，《晉書》第七冊，北京：中華書局，頁 2118-2119。

1986, 頁 300) 等此期的詠物詞皆可見稼軒詠物詞的基調隨著年邁與人生經歷顯得愈加沉鬱。按周濟說：“稼軒斂雄心，抗高調，變溫婉，成悲涼”²¹，此乃稼軒信州所形成的詞風。尤其體現在詞彙的運用上，如“苦”，“恨”，“白髮”，“投閒處”，“垂功名淚”，“無助”等，皆是稼軒因被迫投閒而長期抑鬱於心的不平之氣，情感的直接抒發反映了其主體意識，故構成了其詠物詞充斥著悲涼的基調。

無論從數量、題材抑或是詞中情感表現之深沉與強烈與否方面，江、淮、兩湖時期僅是信州詠物詞發展之初期。這固然是如許伯卿的分析，出仕的稼軒多取社會性較強的題材來創作，自然不能與被迫投閒、屢遭彈劾的信州階段的沉鬱相比，詠物非屬其創作的主要文體，故更顯見信州詠物詞的重要性。

第二節：稼軒詠物詞與宋代詞人詠物詞之特質

在宋代，稼軒之前，已有不少的詠物詞面世。從稼軒詠物詞再對照較其前的宋代詞人之詠物詞，可發現稼軒實際上繼承了前人的特點，亦在此基礎之上再進一步地突破。本論文就此歸結了兩個特點：一、物我關係，二、情志內涵。以此來探析稼軒詠物詞的獨特性。

首先，物我關係其實是經過一個過程發展而衍變的結果。北宋初期，創作主體與客體是一種間離關係²²。這如李重華所說的“將自身站立在旁邊”²³，也

²¹ 周濟《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收錄在辛更儒編（2005），《辛棄疾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頁 337。

²² 按王兆鵬《唐宋史論》所歸納的宋代詠物詞的三種範型：非我化型，情感化型和個性化型。此期屬非我化型，“間離關係”指審美主體只是以相對客觀的態度描繪、再現對象物的外在形

是王國維提出“無我之境”²⁴的一種創作方式。毛文錫、柳永、歐陽修及晏殊的詠物詞均有此詞作。基於宋初尚未擺脫五代綺靡的詞風，以體物為本旨，故此期詠物詞缺少了主體情感及主體意識的表現，導致主體與客體之間不能達到“物我相融”。即使歐陽修及晏殊的一些詠物詞中融入了個人情感，但僅是一種普遍的情感，更確切地說即主體與客體之間仍處間離的關係。蘇軾之前的詞人與物之關係是處於一種離散的狀態，直到其將創作主體與“物”提升至另一個階段，使詞中的“物皆有我之色彩”²⁵，展現出情感化，生命化及個性化的內容。增強了主體意識。王國維謂周邦彥詞屬“若夫悲歡離合、羈旅行役之感”（王國維著，2005，頁 40）其詠物詞蘊含了個人的情感，並謂其詞“物皆有我之色彩”，但也有學者提出別的看法²⁶。

無論如何，稼軒所創作的詠物詞已完全脫離了前人的“間離關係”，並繼承了蘇軾“物皆有我之色彩”的特色，而許伯卿也說“辛棄疾看到事物的剛貞”（許伯卿著，2007，頁 141）將自己放置在物中，亦以我來觀“物”之內涵特質，故任何物皆可融入個人懷抱及國家之恨。《水龍吟·聽兮清珮瓊瑤些》看見泉水之清澈：“明兮鏡秋毫些”（鄧廣銘，1986，頁 299）借以言己之貞潔；《鷓鴣天·徐衡仲惠琴不受》看見琴音“落落難和”之孤傲及琴身“庚庚”之奇特：

式特徵或物的某種內在品性，而為曾將主體的情感、人格精神融化入對象物中。參見王兆鵬（2006），《唐宋詞史論》，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頁 169。

²³李重華《貞一齋詩話》，收錄在王夫之等撰（1971），《清詩話》下冊，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930。

²⁴王國維著《人間詞話》中說明“有我之境”與“無我之境”之別：“有我之境，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無我之境，以物觀物，故不知何者為我，何者為物。”引自王國維著（2005），《人間詞話》，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頁 2。

²⁵說明“我”詠物，“我”觀物，我之意緒、情感投射於外物之上，故“物物皆著我之色彩”，所創造者既為“常人之境界”，更是“有我之境界”；更進一步，“我”與“物”一樣，成了作品中的“主體”（或主要表現對象）引自路成文著（2005），《宋代詠物詞史論》，北京：商務印書館，頁 106。

²⁶王國維《唐宋詞史論》卻不認同周邦彥詞是“物我同一”：“周邦彥詠物詞物與我的關係並沒有像蘇軾詠物詞那樣合為一，物與我是處於間離關係。”參見王兆鵬（2006），《唐宋詞史論》，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頁 177。

“玉音落落雖難和，橫理庚庚定自奇”（鄧廣銘，1986，頁 124）表達不欲同流合污的堅貞。其豐富的人生經歷，再加上繼承了蘇軾詠物詞中“有我”的表現，稼軒的主體意識是相當強烈的。這有別於早期詠物詞人如毛文錫、柳永等人之詠物詞中所缺乏的主體意識表現。稼軒對於人生苦難及生命的存在價值是有所認知的，故其個人的懷抱、胸襟、人格，皆充分體現在信州詠物詞中。

在情志內涵方面，稼軒的表現也是相當豐富的。清代陳廷焯曰晏幾道詞“工於言情”（陳廷焯，1984，頁 17），除了體物以外，其也借詠物來抒懷²⁷。而後來蘇軾對詞在抒情言志方面的開拓，體現在將詠物與抒懷結合起來，實對後來稼軒詠物詞的發展打下了根基。然與稼軒不同的是，蘇軾詠物詞大多是遊戲應酬之作。對稼軒而言，詞乃是陶寫性情的工具，將詞視作為表現其情志內涵的一種重要文體，故其主體意識及情志內涵皆更為鮮明。蘇軾則不然，王灼《碧雞漫志》曰：“東坡先生以文章餘事作詩，溢而為詞曲”（【宋】王灼著；岳珍校正，2000，頁 34）。基本上，對蘇軾而言，其仍視詩文為其主要的文體，而詞乃是“詩餘”、“小道”，故其詞中的情志內涵不比稼軒來得鮮明。

路成文著《宋代詠物詞史論》提到稼軒的情志內涵，乃由詠懷及詠史所構成的²⁸。可筆者認為，對於稼軒來說無論是詠物還是詠史，其實其儼然是在詠懷。這並不是否定稼軒詠物詞所具有的詠史成分，但在此點上，筆者認為詠史的最終目的就是為了抒懷，即詠懷。稼軒將詞視作為主要表現個人情志的工具，如許伯卿《宋詞題材研究》所說的：“辛棄疾的詠物詞將更是將物性、己情、國勢與往事、時世和理想熔鑄在一爐”（許伯卿著，2007，頁 139）因思考到個人及

²⁷ 《蝶戀花》詠荷，有詠物又有抒懷的表現：“雨罷蘋風吹碧浪，脈脈荷花，淚臉紅相向。”引自唐圭璋（1965），北京：中華書局，頁 223。

²⁸ 詠懷及詠史乃是構成情志內涵之元素。參見路成文（2005），《宋代詠物詞史論》，北京：商務印書館，頁 151-158。

社會而有所感慨，也是有展現個人的理想的這些特徵說明了稼軒詠物詞更大的成分是在詠懷，所以稼軒詠物即是詠懷，使物與稼軒有密切的關係。此點會在後面的部分再進一步論述。

前面所說的是詠物詞，但稼軒在詩方面亦有詠物的表現。但為數不多，這就是兩者之間的差別。王士禛《帶經堂詩話》：“詠物之作，須如禪家所謂不粘不脫，不即不離，乃為上乘。”（【清】王士禛著；戴鴻森校點，1963，頁 305）稼軒詠物詞及詩皆有此表現，故在詠物主題底下的詞或詩又是詠物，又是抒情。在體物的部分，稼軒詞與詩皆不像前代的詞人一味地刻畫物之外形，而是要求即物達情，務求表現物之形神之餘，又能投入創作主體的情感內涵於物中。

與其詠物詞一樣，稼軒詠物詩多以花來自況，而其中少不了以梅花來顯其高潔的氣節。如《和傅岩叟梅花二首》其二：“靈均恨不與同時，欲把幽香贈一枝，堪入《離騷》文字否？當年何事未相知”（鄧廣銘，2005，頁 536）寫梅之孤獨高潔氣質；《和吳克明廣文賦梅》：“十頃清風明月外，一杯疏影暗香中。”（鄧廣銘，2005，頁 546）寫“清風明月外”的“暗香”的清高；《和趙茂嘉郎中賦梅》“空谷春遲懶卻梅，年年不肯犯寒開”（鄧廣銘，2005，頁 561），這梅中之懶者不欲“犯寒開”，豈不是稼軒苦苦等待被賞識的機會的心聲嗎？另外，詠石詩《武曲梢歌》：“人間正覓擎天柱，無奈風吹雨打何”（鄧廣銘，2005，頁 523），詠劍詩《送劍與傅岩叟》：“且掛空齋作琴伴，未須攜去抗樓蘭”（鄧廣銘，2005，頁 537）等詠物詩皆抒發了其胸中之感慨。其詠物詩與詠物詞有著異曲同工之處，

但實際上在詩與詞相較之下，還是詞勝於詩。陳模曰：“蔡光工於詞，靖康間陷於虜中。辛幼安嘗以詩詞參請之，蔡曰：“子之詩則未也，他日當以詞名家。”²⁹說明稼軒詞是勝於詩的。按張馨心〈稼軒“詩不如詞”現象探論〉中所提出的論點：“稼軒在創作最為繁富的時期，‘避謗’‘戒詩’，這是造成他詩不如詞的重要原因。”（張馨心，2007，頁134）由於是“歸正人”的身份，加之與朝野人士的苟且偷安之風不同，故造成其在詩不能言的，皆轉化到詞中，故其詠物詞也因此而比詠物詩的質更為高。其二筆者認為詞乃是長短句的句式，不似詩般受特定的音節束縛，長短句式更使其宜於抒發感情。由此可見，這也是稼軒詠物詞勝於詠物詩之因。

²⁹陳模《懷古錄》卷中，收錄在辛更儒編（2005），《辛棄疾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頁109。

第四章：現實中的“物”與信州詠物詞中的“物”之關係

此章以現實中的“物”及詞中的“物”來剖析兩者之間的關係。現實中的“物”即辛棄疾，而詞中之“物”則指具體之“物”。按《禮記·樂記》曰：“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鄭玄注，1981，頁473）指人心與情緒之所以會波動，並通過外在形式如文學創作來抒發情感，乃受到外物之觸動而有所感發。所謂的外在事物，即指一切圍繞在我們身邊且具有生命的自然萬物，如動物、植物。³⁰

人與周邊之物是相依相存的，不能被切割，故人往往將情感寄託於“物”，而“物”又承載着人之思想感情。劉熙載撰《藝概》云：“昔人詞詠古詠物，隱然只是詠懷，蓋其中有我在也。”（劉熙載，1985，頁118）稼軒詠物詞並非一味地狀物，而是蘊含了強烈的主體思想感情，皆具“有我之色彩”。加之退居信州乃非其所願，一生抱負無法實現，唯有藉由詞來抒發胸中的悲憤感慨，深刻地體現了抒情言志的目的。故其詠物詞不止於詠物，有反映現實生活中稼軒的高尚人格精神，也有抒發個人懷抱之悲慨及因國家而發的愛國之情，成為此期詠物詞的核心內容。

³⁰劉勰著《文心雕龍·明詩》曰：“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也指人的內心受到外物的觸動，繼而引發思想感情的表現，顯然人由內心的活動至創作文學的外在表現是受到物之影響。引自劉勰著（1958），《文心雕龍·明詩》，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頁65）

第一節：“更無花態度，全是雪精神”

稼軒閒居信州期間，不必受朝政事之紛擾，閒來無事自然多觀照周遭之物。在過程中，發現物之特性與自己個性、人格有相似之處，便借物來反映自我的人格精神。李瑩<辛稼軒的詠物詞的情與物>提到：“辛稼軒把他對人性人情的感受投射在物象上，用人格修養來提升情思的品位，化作筆下物象的品格。”(李瑩, 2011, 頁 144)故稼軒多以花來象徵人格精神。花之不同象徵不同的特性，乃與人之品格相近，故常借與自己性情相近的花來反映現實生活中的自己，此期尤以牡丹及梅花居多。《念奴嬌·賦白牡丹，和范廓之韻。對花何似》中云：“天香染露，曉來衣潤誰整？最愛弄玉團酥，就中一朵”(鄧廣銘, 1986, 頁 147)。牡丹乃花中之王，色澤鮮豔，具雍容華貴之意。然稼軒偏不愛色彩濃艷的牡丹，反而對“玉團酥”即純潔又高尚的白色牡丹情有獨鍾，反映現實中的自己也如牡丹般擁有崇高的節操。

可在眾花中，“稼軒將梅花看作一種自己矢志追求的崇高品德的象徵”(馬赫, 1986, 頁 68)此崇高的品德，尤以《臨江仙·探梅》最為明顯：“一枝先破玉溪春。更無花態度，全是雪精神”(鄧廣銘, 1986, 頁 190)。梅花獨立於眾春花之中，無春花嬌滴滴之貌，反而展現在冰天雪地中仍能傲雪耐寒的崇高品格。稼軒寫梅花之姿的同時，更是將自己化入梅花中，借以自況，賦予梅花以“雪精神”，形神兼備。其所處的南宋持著苟且因循、委屈求全之態，與其始終堅持恢復山河的態度大相徑庭。另一首詠梅詞既有崇高的精神，也蘊涵了其命運的象徵。《江神子·賦梅，寄余叔良》：

暗香橫路雪垂垂，晚風吹，晚風吹。花意爭春、先出歲寒枝。畢竟一年春
事了，緣太早，卻成遲。未應全是雪霜姿，欲開時，未開時。粉面朱脣，一
半點胭脂。醉裏謗花花莫恨；渾冷澹，有誰知。（鄧廣銘，1986，頁 245）

這首詠梅詞先以擬人手法寫梅於凌寒“出歲寒枝”，為的是要爭先為人們報春。然欲早不得反變成了最遲開的花。梅花在含苞待放、微開之時，非白色而是胭脂色，似說梅早開而失去了胭脂色，變成渾然白色的梅花。稼軒像詠梅花之命運，但實際上是寫其欲馳騁沙場、收復失地的懷抱，奈何事與願違的人生際遇。梅花如此高雅脫俗之態，試問除了具有高尚節操的稼軒能感受以外，還有誰能理解呢？謝章铤《賭棋山莊詞話》謂其：“詞中有人，詞中有品”³¹，此詞正是展現人如梅，而梅又如人的“梅人相融”的崇高精神。《最高樓·客有敗棋者，帶賦梅》有句：“影兒守定竹旁廂。且饒他，桃李趁，少年場”（鄧廣銘，1986：374），稼軒將梅花擬人化，指梅花寧可隱身守在“竹旁廂”，也不願像“桃李”般去取悅別人。若不結合稼軒的經歷來看，絕對不會想到蘊含著豐富的內涵。梅花乃其人格精神的化身，具有強烈的主體意識。

在詠時節詞《青玉案·元夕》有句：“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鄧廣銘，1986，頁 189）詞人在元夕當天一直苦等意中人，但實際上卻有另一層意思。在元夕如此熱鬧的節慶，卻有那麼一位姑娘站在燈光昏暗之處，而此人又是稼軒一直尋覓的人，此人應為了解詞人心中鬱結的知音人。而此人卻獨立於熱鬧的氛圍中，未有融入熱鬧的人群中，可見其有別於他人。在政治道路上始終堅持原則，不願流於苟且偷安的稼軒，在詞中借“知音人”抒發了此情懷。王國維著《人間詞話》說：

³¹ 謝章铤《賭棋山莊詞話》卷九，收錄在辛更儒編（2005），《辛棄疾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頁 365。

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眾裡尋他千百度，回頭驀見（當作“驀然回首”），那人正（當作“卻”）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王國維著，2005，頁8）

說的是要成就一番大事業者或追求大學問者，必須經過此三大階段。此詞屬最高境界，更顯見其高風亮節的品格。在稼軒觀雪後有感所寫的《念奴嬌·和韓南澗載酒見過雪樓觀雪》上片：“兔園舊賞，帳遺踪飛鳥、千山都絕。”（鄧廣銘，1986，頁135）此句正源自於柳宗元《江雪》詩：“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踪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唐】柳宗元著；王國安箋釋，2673，頁268）用意與柳宗元一樣，詠的是雪景，寫的是儘管現實中處於困境，但仍持堅定不移的精神。《生查子·和趙晉臣敷文春雪》詠雪：“漫天春雪來，才抵梅花半。最愛雪邊人，楚些裁成亂”（鄧廣銘，1986，頁404）這句先是寫雪漫天飄飛及梅花半開的情景，雪與梅花亦具貞潔、清高之意，加上“最愛”的是立在雪中的梅花，這實為稼軒的人格。在詠泉的詞作，也有此表現。

第二節：“十里芬芳未足，一亭風露先加”

此“懷”亦延續在抒發個人壯志難酬、報國無門之悲慨的主題上。《西江月·和楊氏瞻賦牡丹韻，宮粉厭塗嬌額》：“西真人醉憶仙家，飛佩丹霞羽花。十里芬芳未足，一亭風露先加”（鄧廣銘，1986，頁165）。“西真人”為西王母；也象徵牡丹。稼軒借西真人來喻牡丹，欲飛升而去，離開塵世間。牡丹乃花中

之王兼具王者之風，故可將之與在一片低落的士風中始終堅持抗金復國的愛國英雄辛棄疾聯繫在一起。從前半句看，詞人似欲離開塵世，過不受朝廷紛擾的隱士生活，但下半句“十里芬芳未足，一亭風露先加”（鄧廣銘，1986，頁 165）轉為感嘆英雄無用武之地，更無奈的是還要受到當權派的連番打擊。這不就是現實中的稼軒的親身經歷嗎？現實中的稼軒雖早有為退居而作打算，但其內心始終縈繞着復國大業，可見閒居乃非其意願。在《賀新郎·賦水仙》：

待和淚，收殘粉。靈均千古懷沙恨，記當時、匆匆忘把，此仙題品。煙雨淒迷儂倦損³²，翠袂搖搖誰整？謾寫入、瑤琴幽憤。絃斷招魂無人賦，但金杯、的皪銀臺潤。愁殢酒，又獨醒。（鄧廣銘，1986，頁 182）

稼軒以詠水仙為出發點而至詠史，固然是詞中的《斷招魂》、《招魂》乃出自於“靈均”。稼軒與其皆懷有身世之悲，因時代弄人而使得他們的理想抱負無法實現，擁有相似的人生經歷。正如前文所述，稼軒詠物詞中的詠史，實已包含了詠懷的成分在內³³。“儂倦損”更戳破稼軒煩惱之緒，故唯有借“殢酒”來消愁，而“獨醒”又見其不同於流俗。題為詠物，實為稼軒被迫落職閒居，政治上失意所發出的感慨。

《菩薩蠻·席上分賦得櫻桃》：“江湖清夢斷，翠籠明光殿。萬顆寫輕勻，低頭愧野人”（鄧廣銘，1986，頁 186-187）。稼軒以杜甫於蜀地時，曾遇野人贈送

³² 儂倦損，儂倦為折磨、憔悴或煩惱之意。儂倦損謂煩惱煞也。引自鄧廣銘（2680），《稼軒詞編年箋注》，臺北：華正書局，頁 182。

³³ 詠史詞和詠物詞一樣，也是唐宋詞中的一種重要的題材類型。詠史詞導源於詠史詩。中國古代詠史詩有兩種基本類型，一承班固之緒，一詩專詠一人一事，意在呈現歷史事實本身；一導源於左思，借詠物史以抒懷言志，故不必專詠一人一事，借古人之事以抒己之懷抱。前者一般認為是詠史正宗，但後者實更為詩人們所樂於採用。因此典型的詠史實以詠懷為旨歸，辛詞之詠史多取後一種。劉揚忠著《論唐宋詞中的詠史詞》，收錄在《詞學》編輯委員會（1999），《詞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頁 2-3。

櫻桃之事及韓愈所寫的皇上於宮殿賞賜給大臣之事來聯想到自身的遭遇，並抒“江湖清夢斷”的報國無門之悲憤。在帶湖閒居的稼軒，無法像韓愈一樣能夠於宮殿品嚐櫻桃，反與杜甫在外飄零有同身世之感。其於官場多年，無法於戰場上衝鋒陷陣，反而只能當地方官員，更堪的是如今還被罷官落職，實在比不上不受官職束縛，在外過得逍遙自由的野人的真實寫照。

在《洞仙歌·訪泉於奇師村，得周氏泉，為賦》：“人生行樂耳，身後虛名，何似生前一杯酒。便此地，結吾廬。待學淵明，更手種門前五柳。”稼軒說“人生行樂耳”，沉醉於酒中，還“待學淵明”在門前種五柳，並號五柳，隱喻着隱居之意。但稼軒心裡真的這樣想嗎？然“公一世之豪，以氣節自負，以功業自許。”³⁴事實上，只不過是借以掩蓋壯志難酬之痛，建功立業才是其一生中所追求的理想。

《滿江紅·和廓之雪》中與其門徒范開觀雪時，借詠雪景來抒發其欲有所為，但卻不能為之的心情：“記少年、駿馬走韓盧，掀東郭。吟凍雁，嘲飢鵲。人已老，歡猶昨。”(鄧廣銘, 1986, 頁 146)據巩本棟《辛棄疾評傳》中記載：“義憤填膺的辛棄疾與王世隆、馬全福、賈瑞諸將商酌利害，毅然決定，乘敵不備，輕騎突襲，自趨金營，生擒張氏，為耿京報仇，向宋廷復命”(巩本棟著, 1998, 頁 48)。詞中的“駿馬走韓盧，掀東郭”指的正是此事，而“吟凍雁，嘲飢鵲”乃詞人借以自嘲處於低潮的自己，引來了無限的悲嘆。但詞人並非完全失去雄心的，“人已老，歡猶昨”正是稼軒內心的真正想法，雖如今已年老但依舊心在恢復的。

³⁴范開《稼軒詞序》，收錄在辛更儒編（2005），《辛棄疾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頁 50。

此主題一直延續至瓢泉詠物詞。陶爾夫及劉敬圻著《南宋詞史》提到此時五十五歲的稼軒進入暮年：“不僅宏圖偉志未得實現，而且接二連三地遭到誣陷打擊，他的情志已由悲憤轉成悲惋，對個人和國家前途已失去原來的自信與樂觀。”(陶爾夫；劉敬圻，1994，頁 136-137)此期的詠物詞多是承載其壯志難酬之情懷。但與前期不同的是瓢泉詠物詞已愈見消極。《歸朝歌·我笑共工緣底怒》云：

我笑共工緣底怒，觸斷峨峨天一柱。補天又笑女媧忙，卻將此石投閒處……

霍然千丈翠巖屏，鏘然一滴甘泉乳……細思量，古來寒士，不遇有時遇(鄧

廣銘，1986，頁 375)

從字面上看，像是以神話傳說來描寫積翠巖之命運，實乃抒“將此石投閒處”之慨。“此石”暗喻現實中的趙晉臣以外，對稼軒個人亦如是。卓人月選、徐士俊評《古今詞統》曰此詞：“慰人窮愁，堅人壯志”³⁵，稼軒憑詞對失意不遇的友人表以安慰，並希望友人能夠以此來堅定理想。先是寫其友趙晉臣之不遇之情，再寫其友終會“有時遇”(鄧廣銘，1986，頁 375)反而更凸顯出稼軒現實中“無時遇”之慨。

《沁園春·疊嶂西馳》詠山之態：“疊嶂西馳，萬馬回旋，眾山欲東”(鄧廣銘，1986，頁 307)寫的是山，以擬物手法來將山擬成馬，山之動如馬之動的磅礴的氣勢。後寫：“老合投閒，天教多事，檢校長身十萬松。”(鄧廣銘，1986，頁 64)顯然，“多事”實指辛棄疾自己，從“檢校長身十萬松”可知其實不願過閒居的生活，此乃長期間居而抒發的抑鬱之情。雖其此期多以詠物來抒發其壯志

³⁵卓人月選；徐士俊評《古今詞統》，收錄在劉揚忠著（1989），《辛棄疾詞心探微》，濟南：齊魯書社，頁 286。

難酬的沉鬱之情。《喜遷鶯·暑風涼月》先是荷花於水上的姿態：“暑風涼月，愛亭亭無數，綠衣持節。掩冉如羞，參差似妒，擁出芙渠花發。”描寫芙蓉花，葉之綠及含羞的姿態。後寫：“千古離騷文字，芳至今猶未歇。”(鄧廣銘, 1986, 頁 407)《離騷》乃屈原之作，言語間道出了現實中的稼軒擁有與屈原壯志難酬之志，既有詠物又有抒懷的成分。馬赫<淺議稼軒詠花詞之成就>：“言荷之恨怨，固然有潘娘、屈子的可怨之事為證；道荷之苦愁，也確有蓮心之苦可稽”(馬赫, 1986, 頁 69)無論是抒發稼軒現實中的懷抱，還是荷花自身，亦有此特徵，說明稼軒之情乃與荷花融為一體。

第三節：“枉學丹蕉，葉底偷染妖紅”

自辛棄疾出生以來，家鄉已被金人所佔據，使其年幼就已經歷了喪失國土之痛，感受民族所受的屈辱感。自南歸後，其始終沒有忘記民族之辱，喪國之痛，尤其閒居後每思到此處，就往往化愛國之思於詞中。劉熙載《藝概·詞曲概》謂其“至情至性人”(劉熙載, 1985, 頁 110)，故所到之處，盡是情，包括愛國情懷在內。

《聲聲慢·嘲紅木犀。余兒時嘗入京師禁中凝碧池，因書當時所見》：

“記當時、風月愁儂。翠華遠，但江南草木，煙鎖深宮。只為天姿冷澹，被西風醞釀，徹骨香濃。枉學丹蕉，葉底偷染妖紅”(鄧廣銘, 1986, 頁 181)。詞序寫道：“余兒時嘗入京師禁中凝碧池，因書當時所見。開元盛日”明確的說明辛棄疾回憶兒時隨祖父辛贊居汴京之事，並借當年所見的木樨來言其愛國之思。

“翠華遠”指皇帝之旗以翠玉為飾，此為宋徽宗、欽宗為金人所虜北去事。其指紅木樨枉學丹蕉偷偷染上艷紅色，但其骨子裡的氣味仍然不能改變其依舊是木樨之事實。其借木樨來諷刺金人雖佔據了中原，融入漢人的禮儀，但仍然不能改變屬他族的事實，更勿論被承認為中原君王。另有詠春作《蝶戀花·戊申，元日立春，席間作》也表達了詞人的憂國之慮：

誰向椒盤簪綵勝，整整韶華，爭上春風鬢。往日不堪重記省，為花長把新春恨。春未來時先借問，晚恨遲開，早又飄零近。今歲花期消息定，只愁風雨無憑準。(鄧廣銘, 1986, 頁 193)

按鄧廣銘《稼軒詞編年箋注》的記錄，這首詞是寫於紹熙十五年，此時辛棄疾已是閒居多年了。在立春之日，詞人並沒有春天來臨所帶來的歡愉，反而發出“往事不堪回首”的感嘆。可詞人沒說明何事不堪回首，遂寫“春未來時先借問，晚恨開遲，早又飄零近”，透露出盼望着花開但又害怕花飄零的複雜心情。而“只愁風雨物憑準”像是感嘆期盼著花開，然在開春後的“風雨”也是無法難料的。周濟《宋四家詞選》評末句曰：“然則依舊不定也”³⁶，莫非指的是自然變化的不定？鄭臨川《稼軒詞縱橫談》：“這是以氣象多變比喻朝廷政令無常”（鄭臨川, 1987, 頁 148）此乃反映了其的內在之意，欲借自然變化的不定來表達現實的國家命運及人生際遇變化的憂慮之情。故可純粹把詞當作是詠物外，也含有詠國家及人生之懷的成分。

《山鬼謠·雨巖有石，狀怪甚，取離騷九歌，名曰山鬼，因賦摸魚兒，改今名。》有句：“依約處，還問我：清遊杖履公良苦，神交心許。待萬里攜君，

³⁶ 周濟《宋四家詞選》，收錄在辛更儒編（2005），《辛棄疾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頁 340。

鞭笞鸞鳳，誦我遠遊賦。”(鄧廣銘, 1986, 頁 142)此處是指詞人獨遊山巖，不僅受盡體力之苦，更苦的是知己難尋，而最後視同樣歷經滄桑、形狀奇特的怪石為知己，並與怪石一起駕馭鸞鳳到天上遠遊去。《遠遊賦》乃出自於屈原，內容為欲到天上去遠遊，流出現實人間中的理想追求，但奈何一切只是想像。這裡可理解為稼軒像屈原般都有強烈的愛國精神，但兩人在現實生活中的理想都難以實現。

瓢泉時期，雖其再一次地受到仕途上的打擊，但也不影響愛國之情的表現，並投射在詠物詞中。《千年調·開山徑得石壁，因名曰蒼壁。事出望外，意天之所賜邪，喜而賦》：“鈞天廣樂³⁷，燕我瑤之席。帝飲予觴甚樂，賜汝蒼壁。嶙峋凸兀，正在一丘壑。余馬懷、僕夫悲、下恍惚。”(鄧廣銘, 1986, 頁 418)“鈞天廣樂”乃借用了趙簡子夢遊的典故來寫自己也想與其一樣在天宮得到天帝的招待及賜之以蒼壁。蒼壁乃是稼軒之居處，與其切身有關。最後一句“余馬懷、僕夫悲、下恍惚。”(鄧廣銘, 1986, 頁 418)為什麼馬與僕夫會感到悲傷呢？原來稼軒雖在天宮受到天帝的恩澤，然其心是掛念著“舊鄉”的，以現實中來說，即使稼軒已閒居於瓢泉，然其仍心系國家的。

《木蘭花慢·題上饒郡圃翠微》有句：“笑白髮如今，天教放浪，來往其間。登樓更誰念我，卻回頭西北望層欄”(鄧廣銘, 1986, 頁 337)，在上饒帶湖時期就已經常登此樓遠望，而如今已滿頭“白髮”，也還是“放浪”無拘束地來往此樓。“登樓更誰年我，卻回頭西北望層欄”更是道出了稼軒寫此詞時心中的感懷。從字裡行間不難發現稼軒的心依舊是惦記著國家，追憶當年因“靖康

³⁷ 《史記·趙世家》：“趙簡子疾，五日不及人。……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引自司馬遷(2014)，《史記》第六冊，北京：中華書局，頁 2155。

之難”而失去國土，由此而生出的感慨，可見即使年邁了，但愛國之情不言而喻。

第五章：結語

本論文旨為稼軒信州詠物詞“物我關係”考辨。綜合以上所述，可作出以下的結論。

首先，從辛棄疾於信州閒居二十年來看，可見信州確實是其生平中的一個關鍵時期。這段時間使其大量創作詠物詞，題材與數量方面都極為豐富。此期所創作的詠物詞，是不同於前期即江、淮、兩湖時期所創的詠物詞。這可從三點來看，主要是數量，題材及情感表現。基於江淮時期的辛棄疾，乃其出仕時期，而信州時期，其已是處於閒居階段，故這兩期所創作的詠物數量自然會有所不同，如江淮時期多創寫社會性，而信州時期則以詠物主題居多。其次，由於在信州閒居的辛棄疾是以詠物詞為主要的創作題材，故所用之“物”自然是多於前期。基於前面這兩點，就形成了信州時期的詠物詞的情感表現之不同，而信州的“物”更是承載了辛棄疾的更深刻的思想感情，顯見信州詠物詞之獨特性。

通過稼軒詠物詞與其他宋代詠物詞人之特質對照之下，可以總結出稼軒詠物詞與前人有兩個不同之處，一為物我關係；二為情志內涵。其一，可得出稼軒與“物”之間並非是“間隔關係”，而是與繼承了蘇軾的“物皆有我之色彩”，其也能物之“剛貞”，故往往詠物詞中的主體意識都較強烈，故詠物詞中亦充分展現了其將個人的懷抱、胸襟、人格。其二，以詞為“陶寫之具”，故稼軒詠物詞中的情志內涵是十分豐富的。有學者認為此乃因詠史及詠懷所構成的。但筆者認為雖有詠史的成分，但就其最終目的而言，還是回歸於詠懷，

而由此更能說明稼軒與“物”之緊密結合。至於，詠物詩方面，雖與詠物詞有著異曲同工之妙，然因非稼軒的主要文體，而詞之長短句更宜於抒情，故詠物詞更能體現稼軒之情志，此點體現在閒居二十年的信州詠物詞中。

再來，通過現實中的“物”與詞中的“物”之關係，更是體現了前文所述的幾點，如“物皆有我之色彩”，“辛棄疾看到事物的剛貞”及於詞中展現抒懷的情志內涵的特質，從而使其信州詠物詞中凸顯出此期鮮明的主要核心思想感情，無論是就個人或國家方面。這點可從其觀周遭之物，能見物之內在特質，故其以“物”來展現高尚的人格；以“物”來抒發壯志未酬之慨，也以“物”來表達其愛國之情。從以上的幾點來看，可以看出其信州詠物詞都承載著其強烈的主體意識及主體情感，使詞中有“我”之影子所在。從個人的品格、胸襟乃至於因愛國而發之感慨全熔鑄於詠物詞，抒懷之成分勝於前人，更超越視詞為“詩餘”“小道”的蘇軾，而使“物”往往就是代表著其個人的思想感情，故現實中的“物”乃與信州詠物詞中的“物”有密切的關係。

參考資料：

一、書目

1. 陳良運主編（1988），《中國歷代詞學論著選》，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
2. 陳廷焯撰（1984），《白雨齋詞話》，上海：古籍出版社。
3. 鄧廣銘箋注（1986），《稼軒詞編年箋注》，臺北：華正書局。
4. 鄧廣銘著（1997），《辛稼軒年譜》，上海：古籍出版社。
5. 鄧廣銘著（2005），《鄧廣銘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
6. 巩本棟著（1998），《辛棄疾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
7. 劉熙載撰（1985），《藝概》，臺北：漢京文化出版社。
8. 劉勰著；范文瀾注（1958），《文心雕龍》，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9. 劉揚忠著（1989），《辛棄疾詞性探微》，濟南：齊魯書社。
10. 【唐】柳宗元著；王國安箋釋（1993），《柳宗元詩箋釋》，上海：古籍出版社。
11. 路成文著（2005），《宋代詠物詞史論》，北京：商務印書館。
12. 【晉】陸機著；劉運好校注（2007），《陸士衡文集校注》，南京：鳳凰出版社。
13. 司馬遷（2014），《史記》第五、六冊，北京：中華書局。

14. 蘇軾撰；【清】王文浩輯注；孔凡禮點校(1982)，《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
15. 唐圭璋主編（1965），《全宋詞》，北京：中華書局，頁 223。
16. 陶爾夫；劉敬圻著（1994），《南宋詞史》，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17. 王國維著（2005），《人間詞話》，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8. 【清】王士禎著；戴鴻森校點（1963），《帶經堂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 王叔岷撰（2007），《莊子校銓·天運篇》，北京：中華書局。
20. 王兆鵬著（2000），《唐宋詞史論》，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21. 【宋】王灼著；岳珍校正（2000），《碧雞漫志校正》，成都：巴蜀書社。
22. 蕭兵譯著（1998），《楚辭全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23. 辛更儒編（2005），《辛棄疾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
24. 許伯卿著（2007），《宋詞題材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25. 徐鉉撰；唐圭璋校注：《詞苑叢談·品藻二》，上海：古籍出版社。
26. 徐松輯（1977），《宋會要輯本》，臺北：世界書局。
27. 楊伯峻（1979），《列子集譯》，北京：中華書局。
28. 永瑤、紀昀等編纂（2003），《欽定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

29. 元脫脫等撰，《宋史》第三冊，北京：中華書局。

30. 鄭玄注（1981），《禮記》，臺北：學海出版社。

二、期刊

1. 李瑩（2011），〈辛稼軒詠物詞裡的情與物〉，《學術交流》，2011 年第四期，頁 144。

2. 馬赫（1986），〈淺議稼軒詠花詞的成就〉，《湘潭大學學報》，1986 年第 1 期，頁 68。

3. 許伯卿（2005），〈辛詞題材構成解讀〉，《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 年第 6 期，頁 114-115。

4. 張滌云（2006），〈略论唐宋咏物诗的写法类型〉，《浙江教育學院學報》，2006 年第 6 期，頁 1。

5. 張馨心（2007），〈稼軒“詩不如詞”現象探論〉，《甘肅社會科學》，2007 年第 6 期，頁 134。

、